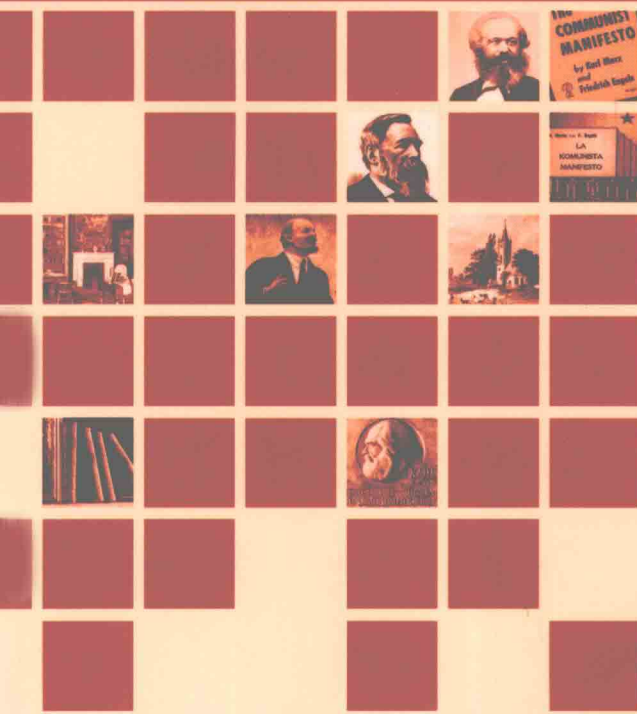


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

中央编译局纪念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集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主编◎俞可平

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

中央编译局纪念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集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俞可平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117-0718-5

I. ①马…

II. ①俞…

III. ①马列著作研究—中国

IV. ①A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8643 号

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74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为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的成果，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译和研究工作的基本经验，认真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光辉历程，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研究、信息、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积极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构建学习型社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承办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60 年（1949—2009）”学术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底在北京召开。为了集中反映此次会议的优秀成果，展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杰出风采，我们整理编撰了这部文集。

本文集共收录文章 19 篇，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既有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综述性文章，也有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概述性论文，还有结合中央编译局自身工作实际而抒发真情实感的反思性随笔。

第一部分以“六十年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为主题，对包括中央编译局在内的我国学术界 60 年来认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研究、信息、出版工作，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进行了总结。这部分从总体上回顾、介绍和梳理了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的伟大历程，包括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

研究、中央文献的翻译、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以及马列文献信息的整理出版等工作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宝贵经验。

第二部分以“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与创新”为主题，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进行了分析概括。有的学者分析了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有的学者论述了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的学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式的转变历程，有的学者对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的主题、主线和成就进行了哲学审视，有的学者从6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的学者梳理了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与基本经验，也有的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进行了深入阐述。

第三部分为“六十年理论园地耕耘与情怀”，主要收录了中央编译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和理论家的回忆性文章。这一部分文章形式多样，文体活泼。以这几位作者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对真理之追求、对事业之忠诚的高尚情怀。有的从学术性层面对翻译经典著作的经验作了总结，有的从工作经历和人生体会的角度回顾了翻译工作中的难忘岁月，还有前辈学者以诗意的语言抒发了一个马列著作翻译者的感悟和情怀。这些文章虽然数量不多，有的篇幅不长，但从字里行间透射出老一辈翻译家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事业的热爱，他们的经验与体会对我们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

6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理论研究与宣传普及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工作获得了喜人的成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力图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编译和研究事业的成就，但由于各个学科的成果很多，历时较长，内容纷繁，经验丰富，本文集难以全面展示，只能从主要方面进行概述。且由于时间仓促，这些文章的撰写和编辑难免存在错误和疏忽，

恳请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自 2004 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来，中央编译局积极参加了工程的有关工作，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也包含着各兄弟单位学者的大力支持、参与和帮助。谨借此书面世之机会，感谢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者对中央编译局事业的关心和帮助；同时也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我局主办的这次学术会议，并为这部文集贡献自己的才智；还要感谢在会议之后为我们提供论文的学者。愿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新的贡献。

编委会

2010 年 5 月

目 录

六十年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六十年	顾锦屏 陈聪 执笔 / 3
中央文献翻译事业六十年	卿学民 李铁军 执笔 / 25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六十年	杨金海 鲁克俭 李百玲 / 39
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六十年中的主题转换	李惠斌 周凡 朱昔群 / 68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六十年	季正矩 执笔 / 100
马列文献信息整理出版六十年	郝卫东 执笔 / 125

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与创新

从“甲子”巨变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的基本经验	石仲泉 / 145
六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体系的形成	庄福龄 / 165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方式需要进一步转变…………… 杨金海 / 174

六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

 主题·主线·成就…………… 郝立新 / 186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郭建宁 / 191

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与基本经验…………… 孙熙国 / 204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闫志民 / 215

六十年园地耕耘与情怀

翻译经典著作要注意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提法…………… 张慕良 / 225

赞集体翻译…………… 王锡君 / 249

译事忆往…………… 何宏江 / 254

和人民共和国一道成长

 ——建国六十周年回忆在编译局的岁月…………… 张钟朴 / 259

回顾五十年…………… 冯文光 / 296

六十年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六十年^{*}

顾锦屏^① 陈聪^② 执笔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结出了丰硕果实，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文本。当前，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做好这项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新的贡献。

一、建国前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出版简况

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一起，以蓬勃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地传播，深刻影响并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努力学习西方的新思想。他们在向中国引进欧洲的各派治世学说

^{*} 文章是中央编译局马列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六十年”课题组承担的 2009 年建国六十周年局委托课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六十年（1949—2009）》成果。

^① 顾锦屏，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② 陈聪，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综合处处长。

时，开始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思想，在一些报刊上译介他们的著作的某些片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多报刊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部分著作的节选译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立即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以“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形式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并建立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行机构。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困难，马克思全书只出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全书只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策略书》、《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伟大的创举》、《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著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翻译出版工作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许多译者和出版者在白色恐怖中，克服重重困难，编译出版了《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第1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论文选译》、《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数十种马列著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心。1938年5月，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内设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1943年5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审核马列著作译文，提高翻译质量。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当时尽管条件十分困难，但马列主义

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6卷和《斯大林选集》5卷，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其中有《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通信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剩余价值学说史》、《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等。1938年在日寇侵占的上海还出版了《资本论》第1、2、3卷的全译本。

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出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编译事业也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译作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品种不断丰富，质量逐步提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达到530余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这些成就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如无边暗夜中的灿烂群星，为革命的实践提供了思想的星星之火，指导和鼓舞人民迎来胜利的曙光。

二、马列著作编译工作新阶段的巨大成就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译工作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新阶段。

194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俄文编译局，从各地调集俄文翻译人才。俄文编译局成立后，开始翻译苏联出版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同年，中央宣传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专门从事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工

作。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央编译局成立后，分别于1953年和1955年启动《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译工程。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于1953年9月正式出版，这是中央编译局成立以后第一部问世的译作，是翻译工作者、理论工作者、苏联专家和我国汉语专家团结协作、集思广益的结晶。这一卷人力投入之多，校订工序之缜密，理论推敲之深入，汉语表达之严谨，在我国经典著作翻译工作中是罕见的，堪称理论翻译的典范。《人民日报》专门刊发社论，并以整版篇幅介绍该卷的翻译和出版情况。陆定一、胡绳同志随后又专文介绍该卷的内容。到1958年，《斯大林全集》全部译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斯大林全集》共13卷，收入斯大林1901年至1934年期间的著作近500篇，340多万字。《斯大林全集》第1卷的编译实践，为后来《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译工作树立了样板，提供了宝贵经验。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及其补卷为蓝本，共出版39卷：第1—33卷为著作卷，第34—35卷为书信卷，第36卷为补卷，第37卷为家书集，第38—39卷为笔记卷。这一版的翻译工作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最初的进度比较缓慢，1953—1955年，仅完成了5卷，出版了1卷。1956年，中央指示要加快马列著作的翻译，为此，中央编译局制定了1956—1960年五年计划，计划在60年代末，完成《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全部著作的编译和出版。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社会各界要求进一步加快《列宁全集》出版速度的呼声甚高，在这种形势下，原有计划又经多次调整，最终决定在1959年10月1日前完成《列宁全集》第1版全部38卷的翻译，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中央编译局采取有力措施，实行“全局一盘棋”，动员全局力量，统一调度，优化组织，简化程序。全局同志为完成这一宏伟计划，全力以赴，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争分夺秒，日夜苦战。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也紧密配合，步调一致，共同为完成献礼计划而奋斗。1958年出版了9卷，1959年1月到9月出版了22卷，其中有两个月每月出版了6卷，到建国十周年，全部38卷（当时俄文版第39卷尚未出版）、总计1500万字的《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正式出版，实现了我国编译出版史上一个空前的创举。后来又翻译了俄文第4版增补的第39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主要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编译，1955—1960年，编译出版6卷。1960年后，随着《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相继完成，工作重点转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编译进度随之加快。到1965年，翻译出版了第1—22卷（其中第20卷于1971年出版），到1975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定的39卷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后来，俄文版又编辑出版了11卷补卷。1977—1985年，11卷补卷完成编译出版。至此，历时30年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全部出齐，总计3200余万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由三部分构成，第1—26卷为著作卷，第27—39卷为书信卷，第40—50卷为补卷，收入了两位革命导师的2000多篇文章和4000多封书信。此外，还收入了400多件相关文献资料，其中包括马克思家庭成员的一些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和谈话记录，以及他们参与起草的各种决议、文件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三部《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它们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文献依据，为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中国化提供了基础文本。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此外，为适应不同读者、不同领域的不同需求，中央编译局和国内

其他科研单位、大学以及个人还大量编选了各种版本的选集、专题文集、专题言论汇编以及各种选读本和单行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种类，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作出了贡献。

经典著作的选集本是供广大干部和群众阅读的版本，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教学人员的常备书籍，入选文献既要保持理论的系统性，又要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选集的编目原则，是在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书信中选编或节录各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力求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最重要的观点，使读者通过有限的篇幅，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和精髓。

1960年，中央编译局从《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中选出列宁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205篇，编成《列宁选集》中文第1版，共4卷，约258万字。1972年，对《列宁选集》中文第1版作了调整，重校了译文，编成《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收入列宁的主要著作178篇，总计258万字。1965—1966年，编辑完成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但未公开发行。1972年，经过重新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问世，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89篇，书信96封，总计211万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和《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于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分别为949万部和1109万部。这两部由我国自行编辑的选集，较之建国初期流行的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和《列宁文选》（两卷集），内容更充实，选材更符合中国读者需要，译文质量也有明显提高。1962年，编成《斯大林文选》（上、下册），收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之外的103篇文献，共46万字。1975年人民出版社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编辑了《马列著作选读》三册，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59篇，53万字，共印384万部。

此外，有的单位和学者也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如《马克思数学手稿》（北京大学）、《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纲》（刘潇然）、《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刘潇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比较重要的著作基本上都有了单行本，许多重要著作多次再版，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有些著作还同时出版不同的译本，如《资本论》既出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也出编译局的译本；《共产党宣言》既出编译局的译本，也出成仿吾的译本；《反杜林论》既出编译局的译本，也出吴黎平的译本。这些单行本发行量很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改革开放时期编译工作的新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也出现新高潮。新的形势要求编辑收文更全、译文更准确的马列著作全集本。国外陆续出版的马列著作的全集本和选集本为我们编译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提供了条件。

中央编译局从1975年开始为编译《列宁全集》第2版作准备。1977—1990年，编译局组织全国17所高等院校作为协作单位，翻译未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列宁文献，编成《列宁文稿》，共出版17卷。1982年5月，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编译《列宁全集》第2版。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和新闻出版署的支持下，中央编译局联合全国12所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重新校订原有译文，翻译大量新文献，1990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全部出齐。之后，又编辑了《列宁全集总索引》（共3卷，包括总目录、主题索引和中俄文版页码对照，总计220万字）。

新版《列宁全集》是我国自行编辑的收文最全的列宁著作集，共60